

简论《创业史》中的民间叙事形态

王岩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事形态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可读性。在这样的文本世界里,是否保存了乡村民间的社会丰富、生动、复杂的面貌呢,本文就此问题作以探讨。

[关键词]《创业史》;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形态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76-02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事形态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可读性。“在十七年时期,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含有特定的含义,陈思和先生认为其:首先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想和立场,其次包含了民间日常生活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

柳青的《创业史》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而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本文以柳青《创业史》为例来讨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形态。

前面提到的陈思和先生关于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有两层含义。

一、民农的民间生存品质

柳青的《创业史》符合国家政策的民间想象,使小说文本呈现出阵线分明的两条线索:一条是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等拥护合作化运动,坚决走共同富裕的贫雇农;另一条则是反对合作化运动,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世杰以及富裕中农郭世富和村长郭振山。处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动摇的梁三老汉、任老四等。小说一开始便写梁三老汉两代人发家致富的努力,但直到他“累弯了腰”却仍旧住在那个灰溜溜的破草棚屋中。作者一开始便交代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关于发家致富问题上的矛盾。梁生宝热心于合作化,打破了老汉创立家业的美好憧憬,激起了老汉对于新政策的反感。

《创业史》中的正面人物梁生宝虽少了浮夸、口号性,但其阶级属性仍很浓重。正如小说所叙述的那样,“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农民梁生宝似乎生来就是无产阶级战士,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看到一大群庄稼人围着正在打架的兄弟看热闹,他弄清了打架的原因后,便高度概括地说:“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他进山砍竹,便归纳提

炼出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制度”的革命。严家炎说到梁生宝这一人物时认为:“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表现不足;并且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问题。”改霞纯真热烈的感情,共产党员的理智,在他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了事业”,所以他推开了紧靠着他、待他搂抱的改霞。作者将梁生宝置于了一个完美英雄的高度,正像严家严先生所说,“过分理想化”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塑造梁生宝这样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是必要的,可以以此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展现其光明美好的前景,从而鼓舞人民的斗志。“今天看来恰恰是梁生宝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觉醒和不断上进的年轻一代农民形象,而那些以为中国农民就一直是《故乡》里面的那种愚昧和需要被启蒙的被动对象才正好犯了和梁三汉一样的停滞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偏见。”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位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私有者和小生产者,是民间传统的真正代表。农民的道德品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存品质,他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农民性格,勤劳、朴实、善良,同时又保守、自私、狭隘。千百年来,乡村农民的贫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民为摆脱贫困,与天斗、与地斗、与剥削和压迫斗。土改后,农民终于分到了自己的土地,面对合作化的新浪潮,梁三老汉的犹疑、彷徨、不安是符合真实农民当时的精神困境的。农民的民间生存品质其实就是物质欲求不断追求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小说开篇写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矛盾其实就是梁三老汉追求物质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农民的第一要义是生存,对于革命,他们认为只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便会去拥护。像梁三老汉面对合作化的犹疑不决,老党员郭振山的反对和暗暗较劲,其实都是不断在农村恣意蔓延的发

家力量在作祟。农民们被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念头深深地吸引着,不能简单地将这样的行为归结于革命觉悟的高低,面对合作化彷徨犹疑的梁三老汉、任老四是在看到合作化所带来的实在利益后,才卸下包袱,欢欢喜喜地参加合作化,其中实实在在的利​​益就是多打粮食。如果农民的革命热情不是被物质利益而是被革命理想所规划的美好明天所驱使,那农民和革命者又有什么不同?正是农民的这种近似于狭隘自私的物质欲求的民间生存品质,才使得梁三老汉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农民形象,恰恰承载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形象。新的社会固然需要像梁生宝那样的新人,但梁生宝式的人毕竟是少数,从这个角度来说,梁三老汉、郭振山之类的人物形象似乎更有社会意义。

在生活欲求支配下,梁三老汉的逐步转变也显得合情合理,在土改分到了土地、个体经济得到保障后,他不愿去冒风险搞合作化,对梁生宝的做法极度不满,表面上与他生气,嘴里却不无讽刺地叫他“梁伟人”,咕哝着“你小子不喜愿对我说,我也不喜愿问你”,赌气说要吃鸡蛋、下馆子的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关心生宝互助组的进展情况;看到生宝经历买稻种、组织人进山砍竹,实行新法栽秧,组织互助组日常工作的成长变化后,在粮食统购工作顺利完成后,老汉明白,“最替儿子担心害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最后他穿上了儿子为自己做的一套全新的棉衣棉裤,真正高兴了。“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不仅仅在于对农村落后人物的批判,更注重的是对落后人物思想的逐步改造,这就使得梁三老汉的转变更加让人信服。《创业史》长久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梁生宝,而在于其反映了民间力量、生活力量 and 人性力量。

二、民间生存情态与景观

柳青的《创业史》还描写了地道的陕西民间情态与景观。农民四季务农脱口而出的民间谚语,郭世富上房架梁,“上梁恰逢紫微星,立柱正值黄道日”,“太公在此”的民间迷信传统,集市崇粮食买客与牙客凉帽下摸手指议价的民间特色等,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民间生活图景。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存在于其间的复杂与生动的人物关系值得玩味。

当外在的政治强大到一定要农民服从这一规范时,民间文化形态在小说作品中就变成了一种隐含的结构性因素。所谓隐形结构,“是指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

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

小说中关于翠娥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关于她的风流韵事却人尽皆知。她是一个有伤风化的女人,经常做些“侍门等候”的事情。作者并不是想表现对从旧社会过来的这个女性的可怜,并给予同情;相反,翠娥的存在,却暗示了下堡乡民风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弱点。她的丈夫白占魁明知道姚士杰与她有染,却不以为然,竟然想利用老婆与姚士杰的旧情,利用老婆的肉体来换取生存的需要。姚士杰为了破坏试办的蛤蟆滩农业社,趁男社员开会、白占魁不在家的空隙,溜到他们草棚屋后的窗口,叫出昔日情人李翠娥,告诉她怎样引诱高增福,把他搞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翠娥这样一个暗娼的形象竟然出现在《创业史》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中,与其说作者是想渲染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复杂性,不如说客观上勾勒了社会底层的某种民间性。如果说翠娥是肮脏的,那么从另一个侧面反衬出与她接触的众多男人的龌龊。她是“显”的,男人是“隐”的。对于翠娥描写得越生动,小说的民间文化特质就越明显。

素芳是小说中一个特殊的女性,她的悲剧是罪恶的旧社会造成的。一个人的过去不管多么悲惨总能引起别人的怜悯与同情,但女人失去贞洁是不在其范围内的,尤其是在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农村,这只会引起别人的不屑与鄙视。周围人对待素芳的这种态度,作者并没有加以批判,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残留物在当时普遍存在,就是梁生宝这个近乎完美的形象,他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是和蔼宽容的,而唯独对待素芳例外。他不顾众人反对吸纳白占魁入社,对他人的不理解耐心开导、讲解,但他却和其他庄稼人一样鄙视和不屑素芳。素芳向生宝表示过好感,他却并没有开导、帮助、改造她,而是“冒了火气,很不客气地申斥她”,素芳向生宝哭诉“她还没有解放,没有参加群众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生宝却硬着心肠,违背着他宣传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主张,肯定地告诉素芳:“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生宝的拒之千里,将素芳向堕落更推进了一步。尽管小说把梁生宝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完美形象,但他始终逃不脱民间封建思想残留物的作祟。素芳的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悖反梁生宝这一完美形象的作用,这样使小说的民间情态景观展现得淋漓尽致。

柳青的《创业史》在那个时代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符合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还在于它独特的民间叙事视角,反映了民间力量、真正的生活力量,这带给我们清新的感觉、审美的情趣、深深的反思。

[参考文献]

- [1]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景忠.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J].东疆学刊,2008,(1).

- [4]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J].文学评论,1963,(3).
[5]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艺出版社,2002.
[6]柳青.创业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